

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布兰顿式转化

杨兴凤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南宁 530004)

摘要: 在诸多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当代解释与选择性使用中,来自分析传统的布兰顿是独特醒目的。但布兰顿的这种转化式利用,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黑格尔的思想原旨与观念架构体系,这既体现“大陆——分析传统”寻求融合所要面临的问题症结,也反映英美分析传统厌倦了形式化分析进路后寻找切入现实问题解释的发展冲动。带着分析哲学传统的布兰顿及匹兹堡学派的思想家们在“语言转向”后的思想基调中来重新发掘黑格尔哲学的承认理论,这会带来诸多后效以及待商榷的结论。

关键词: 黑格尔; 承认理论; 布兰顿; 匹兹堡学派; 分析化使用

中图分类号: B 516.3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1)06-0037-10

黑格尔实践哲学之复兴,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在于学者们重新注意到了黑格尔对自由的理解之“承认”本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建设性的后果。在这股复兴潮流中,其承认理论成为当今各种各样的“回到黑格尔”主张的一个交汇点。霍耐特 2018 年的新作《承认:一个欧洲观念史》中主张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能够融合法国与英国的承认范式,从而为当代政治文化的自我理解提供有实质深度的思想基础。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科耶夫对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著名解读中就把“寻求承认”当作人类最根本的欲望,这种解读影响了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等一大批思想家。而在当今的北美,则呈现了截然不同地对黑格尔思想解读的路径,但承认理论依然成为一个理论交汇中枢:皮平(Robert Pippin)、平卡德(Terry Pinkard)等通过解释黑格尔关于“自我意识”的结构、“行动”理论重新强调其实践哲学的内涵时,把承认理论作为解读的关键环节。而布兰顿在利用分析哲学资源切入黑格尔哲学时,为解决规范来源的问题而在相互承认概念中找到规范语用学的基础,据此激活英语世界对黑格尔的新研究与新解释,开辟出一条对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进行了转化式的利用的分析路径。但布兰顿的这种转化式利用,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于黑格尔的思想原旨与观念架构体系,这既体现“大陆——分析传统”寻求融合所要面临的问题症结,也反映英美分析传统厌倦了形式化分析进路后寻找切入现实问题解释的发展冲动。

一、匹兹堡学派论域中的黑格尔承认理论

(一) 走出对黑格尔哲学贴的“唯心主义”标签

分析哲学家们抵制黑格尔,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误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一个存在于这些分析哲学家们之中的基本共识是:唯心主义否认外部世界的存在。罗蒂就在《实用主义的后果》中说:黑格尔保留了认识论,但是丢弃了康德的物自体,他这样做的时候,使他自己以及整个唯心主义成为实在论反对的靶心。^① 普特南也认为,像“心灵构建世界”这样的思路就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思想核心。罗素、摩尔等分析哲学

收稿日期:2021-04-10

作者简介:杨兴凤,女,云南昆明人,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从圣路易学派到匹兹堡学派黑格尔主义的实用主义化研究”(项目编号:17BZX080)的阶段性成果。

^① Richard Rorty, *Consequences of Pragmatism*,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p.16.

事业的开创者都以不同方式重申经验主义所认为的——是心灵去发现外部世界,而不是被心灵建构——是与黑格尔的思路即一切都在精神中、没有超出精神之外的实在的思路是相反的。

匹兹堡的哲学家们虽然处于分析哲学的潮流中央,本身具有分析哲学的诸多传统特质,但他们都反对以“外部世界的实在”这样的问题来衡量黑格尔哲学,所以他们并不在这种“唯心主义”误解的框架之下而去拒斥黑格尔,而是选择性地开发黑格尔的资源。布兰顿就试图阐明,对客观性的界定不能在“实在论/反实在论”这样的语境中进行,我们应当走出形而上学的游戏,走向一种与推论语义学相结合的实践考量,它会呈现为一种有清晰结构的实用主义。这种思考最关键的是,从“社会的视角”去理解客观性的本质(这是使他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放置在寻找规范来源基础的原因)。麦克道威尔在《心灵与世界》的前言中说,他是在布兰顿的引导下发现了《精神现象学》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心灵与世界》和布兰顿的《使之清晰》可以被解读为是对《精神现象学》的一个导论。^①他的“黑格尔式沉思”体现在他采取了黑格尔那种整体性思维,即他认为并不存在单纯的自然法领域,价值和意义深刻地交织在自然进程中,任何试图割裂它们的做法都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个体心灵和社会心灵。平卡德(Terry Pinkard)显然也是在这条线索上来理解黑格尔,他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思维的逻辑空间纯粹是建立在我们所参与的社会空间中,引用平卡德的表达式就是在“给予和索取理由的实践”^②中,据此,主体间的对话模式提供了理性行为的规范结构。至于塞拉斯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雷丁曾做过这样的描述“塞拉斯作为形而上学者并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不过,他植下的种子后来成长为果实丰硕的黑格尔大树,1994年出版了两本被认为是那个时代分析哲学最重要的两本著作——麦克道威尔的《心灵与世界》和布兰顿的《使之清晰》。这两本著作最显著的特征是剥去了塞拉斯形而上学内核的实在论元素,而承认其与黑格尔哲学的持续相关性。”^③据此可以看到,塞拉斯开启了匹兹堡哲学家们的黑格尔哲学之旅,并在布兰顿和麦克道威尔的解读与转化下使黑格尔哲学与分析哲学的结合开始了。

(二) 作为规范来源的黑格尔承认理论

在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承认理论,所要实现的是经验主体的理性重构,它包含两个决定性的努力:第一,康德式自我幻象的关键性解除;第二,伦理道德实践上自我视角的去中心化。黑格尔哲学观点在向这两个方向的运动中,精神概念(Geist)为进展提供了核心驱动。黑格尔式主体的成长旅程当中,主体“发觉”自身一直与他者同在,这个认知结论是通过语言、劳动与相互承认的中介的考察而完成的。并且,这些因素被认为是参与和构造了所有的现实关系。据此,黑格尔将主体描述为一个包含在过程中且嵌入到背景中的主体,并且拒绝这个认知着、言说着和行动着的主体与他者之间原初的鸿沟,即一个主体并不需要为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原初鸿沟背负补偿,而是一直与世界相关联。这种思想内核在他的两个规范性概念“爱”与“自由”当中得到一以贯之的表达“爱”是将自身的存在委身于他者之中,“自由”是在他者中依靠自身的存在。因此,一种历史性意识早已从黑格尔耶拿时期的著作中就已发育,这种历史意识的发育使黑格尔哲学后来结出革命性的思想果实:人类心灵的历史性、中介符号的客观化、行动者的个体性与他们的背景历史的关联性。这几个认知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世界的观点以及对自身的认识范式的认知。总之,黑格尔想要完成对我们理性标准的起源性考察与背景性关联,而这只有通过追踪意识穿越历史的谱系才能得到说明。这个穿越过程的历史性意义就在于说明:行动者、说话者的符号结构是主体间共享的,这种世界观可以被通俗地表达为生活文化形式,也可以被黑格尔正式表达为精神科学的客观领域。而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就是这种哲学思想表达的一个关键机制。

布兰顿认为黑格尔对当代分析哲学最具影响力的关键思想就包含在其承认理论当中:“黑格尔的

① John McDowell, *Mind and Worl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ix.

② Terry Pinkard, *German Philosophy 1760-1860: The Legacy of Ideali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20.

③ Paul Redding, *Analytic Philosophy and the Return of Hegelian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11-12.

观点是当你采取既是承认者又是被承认的态度时所得到的东西,它们都是权威的和负责的,它们也都是构成真正的规范性资格的本质必要条件,另外还需要这两种态度是对称的和相互的(gegenseitig)。在一种确定的意义上,黑格尔也认为这些各自的必要的规范性态度一起充分地构成规范性资格。构成规范性资格的是相互的承认。”^①简言之,布兰顿在黑格尔的哲学遗产中发现了规范来源的真正说明:黑格尔用社会实践语境代替了康德的先验路线,这种对认知主体的去先验化运动为规范来源找到了真正的基础。布兰顿指出“黑格尔的主要革新在于提出,为了坚持康德的洞见(即心灵、意义和理性的本质特征是规范性),我们必须在社会性状态的基础上理解权威和责任这样的规范性状态。康德用理性活动来综合规范性的个体自我或作为统觉统一体的主体,黑格尔拓展了这一思路,用相互承认的实践来综合规范性的个体自我和他们组成的共同体。”^②所以,自我和共同体都是通过承认而建构起来的规范性结构。^③

在布兰顿那里,黑格尔对规范的理解是推论主义的(inferentialism),规范的建立和应用是基于相互承认的推论性活动,这种相互承认是一种主体间性的视域的社会根本结构表达。布兰顿对“推论”的理解承继了皮尔士传统,即不在一种公共性的符号互动中,意义的获取和固定是不可能的。成就规范的基础一定是一种普遍性和中介性的符号交往活动,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本身也是具有推论性结构的思想(符号共同体),它既受制于推论之网也成为推论活动所不能离开意义源泉并享有推论的力量。换言之,作为规范表现的自律只有建立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实现,相互承认的规范才同时具备权威与责任。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中的主人与奴隶如果不在相互承认的基础上,主人就会变成无责任的权威,奴隶就会变成无权威的责任。所以布兰顿将黑格尔所阐明的相互承认机制放在了他对于规范来源说明的核心。^④

布兰顿通过承认概念在语言和精神之间建立起了特定的联系,最关键的一步在于他将语言理解为是通过相互承认的过程而建构起来的:语言是规范构成的范例,概念是立基于承认实践活动上的“我能通过这些明确的概念规范约束我自己,因为它们以一种‘已经在运行’的公共性语言实践一直都在那里,进入其中……使我能够使用公共语言的权威也同时是我要为其负责的权威,并且赋予其他人以权威从而使我对确定的概念内容负责任。”^⑤布兰顿认为,这就与黑格尔哲学所要传达的主旨符合起来“个体为自己所做的事立即就成为他为整个物种所做的事……与此同时,整个物种的存在和活动成为个体的存在和活动。动物的自私行为立即就成为不自私的,自私性,取消个体的特殊性立即就成为有利于个体的。”^⑥个体与共同体、以及个体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反映着他们所共享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形式的独特性,在这个过程中,相互承认的辩证之网的结构使个人社会化并个体化。这是黑格尔承认理论所要完成的观念使命。

① Robert Brandom, "Some Hegelian Ideas of Note for Contemporary Analytic Philosophy", *Hegel Bulletin*, 35, p.8.

② Robert B. Brandom, *Reason in Philosoph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6.

③ Robert Brandom, "Some Pragmatist Themes in Hegel's Ide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 2, 1999, ISSN 0966-8373, p.169.

④ 其实,哈贝马斯在论述黑格尔哲学的当代价值时,与布兰顿观点可谓不谋而合。他认为“黑格尔是第一个将先验主体放置到情境中并且也是第一个将理性置于社会空间和历史性时间中的人。洪堡、皮尔士、狄尔泰、杜威、卡西尔和海德格尔,也许我们还可以考虑维特根斯坦这些后康德哲学家都在试图将语言、实践和生命的历史形式处理为不同面向的理性的符号体现,这点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Jürgen Habermas, "From Kant to Hegel and Back again: The Move Towards Detranscendental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 2, 1999, p.129.) 在哈贝马斯那里,黑格尔哲学的主旨就是一场批判和超越心灵主义哲学框架的庞大尝试。这种尝试在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当中集中得到体现。

⑤ Robert B. Brandom, *Reason in Philosoph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73.

⑥ Hegel, G.W.F., *Jenaer Systementwürfe I*. Hamburg: Felix Meiner.1986, Fragment 15, S. 182.

在布兰顿那里,黑格尔《精神现象学》文本中的——“说话的口,劳动的手,还有走路的腿,如果我们愿意添加上去的话,都是实现内在和完成内在的器官,所以它们本身就包含着行动自身或内在自身;内在通过这些器官而获得外在性,成为外在行为,而行为却是一种从个体分离出来的现实。语言和劳动都是外在的东西,在这种外在的东西里,个体不再保持它的内在于其自身,而毋宁是让内在完全走出自身以外,使之委身于外物。”^①——这段话是关键性的,因为它表达了黑格尔哲学为分析哲学提供的可资养料:内在通过外在而外在化,从而突破主体性限制,并通过符号媒介的客观化持存形成的背景来对说话者、行动者的偶然性和独立性进行规范。

二、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布兰顿式转化的根本特征

布兰顿使我们能够以现代分析哲学相亲和的视角来重读黑格尔的哲学概念。在这种视角中,黑格尔不仅成了奠定规范基础的筹划者与参与者,他的相互承认概念还为维持规范内容的独立性、为走出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这个最后避难所提供了一种创新性策略。黑格尔的承认理论被分析哲学训练出身的布兰顿进行了“分析化使用”。这种“分析化使用”呈现的根本特征为:

(一) 在反基础主义的认识论框架中引用和使用黑格尔哲学

认识论领域是分析哲学的主阵地。将黑格尔哲学引作讨论认识论问题的资源,在匹兹堡哲学家们当中是一个主要特征。虽然麦克道威尔说,分析哲学从黑格尔的观念那里获得营养,这似乎是一个不太寻常的事。^②但这种引入的一个根本原因在于,黑格尔能够为“反对直接性知识”提供思想资源,即对于匹兹堡学派对“所予神话”的批判任务中,黑格尔的整体主义思维以及反表征主义的活动认识论是其传统思想资源(在黑格尔那里,会发现许多对表象主义知识论的拒斥^③)。塞拉斯在《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1956)一开篇对其思想任务进行申明时就将黑格尔哲学引为同道^④,认为他的工作实质上是克服近代以来认识论基础主义的一种努力类型。基础主义持一种基本观点:许多“被给予”的东西如感觉内容、物质对象、甚至是所予性本身等都被当作是知识的基础层面,它们可以在发展成熟的知觉中直接得到而未被心灵活动(概念、范畴)所作用。而塞拉斯以及其后的匹兹堡哲学家们所要做的正是要反对这种直接性,他们要论证一个从开始就被概念所渗透了的世界图景——一种“直观—推论”的活动连续体。

匹兹堡的哲学家共持一个黑格尔式的知识信念:概念只有在一个不断进行中介和交互的过程中才能获得其具体的内容。黑格尔在认识问题上拒斥康德的先验方法的,对于他来说,独立于运用过程的先验范畴以及直观层面的心理自发运作是神秘的,认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认知关系中主客逐渐统一。黑格尔的策略在于证明,直观不是直接意识中一个原初地给予的、自明的(自我确证的)或根深蒂固的因素,而是本身是思想之某个中介内容或决定项。^⑤而且,在黑格尔那里,语言中的逻辑,“它渗透了人的一切自然行为,如感觉、直观、欲望、需要、冲动等,并从而使自然行为在根本上成为人的东西,成为观念和目的,即使这仅仅是形式的。”^⑥这与匹兹堡哲学家们所要论述的——并不存在无概念运作的直观、以及直观中早已包含了概念的作用的——观点是一致的。布兰顿虽然为维持对世界客观性的可答复性而坚持了最低限度的表征,但他还是坚持了一种对二元论的静态认知理论的表征主义的根本拒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2页。

② 约翰·麦克道威尔《黑格尔与所与的神话》,汪洋译,《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第72页。

③ 艾伦·汉斯《实用主义作为自然化的黑格尔主义:战胜先验哲学?》,海尔曼·J·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37页。

④ 参见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

⑤ 艾伦·汉斯《实用主义作为自然化的黑格尔主义:战胜先验哲学?》,海尔曼·J·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第151页。

⑥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8页。

斥,他认为我们的任何感觉和认知都不是一次成型的,是在学习中不断地调整和修正,这与古典实用主义者的“经验”概念重释是汇合的,也与皮尔士所开创的可错论思路是根本一致的。

当布兰顿为代表的分析哲学思路在此框架中来解读黑格尔哲学时,黑格尔通过承认理论所追求的更广泛目标就被限制在知识论范围内了,它仅仅成为推进分析哲学事业的资源。就如麦克道威尔所说,“我把黑格尔的概念描绘为对康德的所与性框架的驱逐。我是从指出黑格尔对于分析哲学无足轻重开始的,但是康德和塞拉斯已经位于分析哲学的舞台上,以我所论及的方式走进黑格尔,或许能让他对分析哲学来说也能成为可用的资源。”^①而罗蒂就更直接地描绘了作为分析哲学当代后嗣的匹兹堡学派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路线图:塞拉斯将分析哲学引出它的休谟阶段,引入它的康德阶段;布兰顿将分析哲学引出它的康德阶段,引入它的黑格尔阶段。^②

但是,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仅当作是解决认识论问题的方案,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其要完成的理论使命,这可以体现在以下几点:首先,就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黑格尔的“承认”除了具有心理、知识和道德等层面的含义之外,还具有“存在”层面的含义。被承认就意味着在一个系统中获得了存在,它没有被排出这个系统。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复兴所围绕的“承认”概念主要是在这个层面的即存在来展开的。^③其次,黑格尔哲学的宗旨之一在于要完成对“自由”的重新阐释,建构这种新的自由理论的关键性环节就是对相互承认理论的阐明,正如皮平(Robert Pippin)的发现那样,相互承认的自由是黑格尔自由理论解释的核心,在黑格尔那里,“一个真正的个体乃是一个自由的个体,各种承认关系以复杂的方式为自由主体的可能性提供了条件”。^④黑格尔对自由的阐释表现出很强的“交互主体”特征,这是需要借助其承认理论来阐发的。而且,相互承认的机制中包含黑格尔所要表达的体现理性的国家理论,因为,黑格尔所理解的自由只有在理性国家中才能实现,而理性国家是由诸主体之间相互承认的关系的确定化而构成的。再次,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包含着对善的生活的一种现代阐释,“一种有价值的善的生活包含了对各种现代社会制度的认同,只有参与到这样的社会制度当中,通过选择并确认重要的现代社会角色,一种与他人一起的善的生活才能产生。”^⑤综上所述,若只将黑格尔的承认理论如匹兹堡哲学家们所用那样,只将其主要限定在阐明认识论问题的解决上,则承认理论及其在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关键作用就被单面化了。

(二) 在语言学转向的后效中阐述黑格尔的承认理论

分析哲学家们在后黑格尔哲学时代一致都认为,在语言学的框架内开展哲学分析才是哲学的正当事业,从而形成了理性必须被镶嵌在一种语言秩序中来运作这样的哲学信念。语言分析哲学实际上就是在批判哲学中的“心理主义”式的意识哲学而开端的。在分析哲学家们看来,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只能出现在能够被说出的语言中,一个对象如果无法在命题中得到表述,则它的逻辑优先性是无法理解的,也就是说,语言与世界的关系并不是一个逻辑虚拟物向现实世界的跃迁,这实质上是将知识的秩序(语言命题作为理性的显现)融入存在的秩序(语言构架中的人化世界)的过程。但分析哲学家也在其思想发展中逐渐认识到,语言和事实之间并不是一个直接同构的关系(如维特根斯坦早期哲学曾有过的哲学信念),还需要在一个共同的环境中、在每一次语言交流中与事实的摩擦中通过把承接的和创造性的规则认同接受下来。这是一个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过程。匹兹堡哲学家们作为当代分析哲学运动的活跃成员,当然承接了分析哲学运动自20世纪以来发展所沉淀的理论后果。

① 约翰·麦克道威尔《黑格尔与所与的神话》,汪洋译,《哲学分析》2018年第1期,第84页。

② 参见塞拉斯《经验主义与心灵哲学》,王玮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7页。

③ 丁三东《承认:黑格尔实践哲学的复兴》,《世界哲学》2007年第2期,第84页。

④ Robert B. Pippin, "What is the Question for which Hegel's Theory of Recognition is the Answer?"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8: 2, 2000, p.156.

⑤ Robert Pippin, *Idealism as Moder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92.

麦克道威尔就认为,与理性运作深度相关的语言作为不断积累的文化传统不但确切地刻画了事实与价值的交缠,还能把我们对自然的理解真正落实到一个历史性的语境中。他认为,语言的使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互相证成的层面上展开的,而这就必须采取黑格尔的社会性和历史性路线。而此时,黑格尔的承认理论显然是最有效用的资源。但此时的承认理论被转化成语言层面的“相互证成”。不约而同地,在麦克道威尔的“教化”概念中包含着将个体放进一个共享的语境中成长,语言与理性运作深度关联,阐明语言就成了麦克道威尔使用黑格尔思想元素的方案。可以说,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意识来为规范找到基础就成匹兹堡哲学家们的共契。

这种在语言框架中去理解和利用黑格尔哲学在布兰顿那里也有体现:在布兰顿的理解中,“黑格尔哲学最具总体性的观点是,具有自我概念的生物是发展过程的主体,他们呈现出一种独特的结构”,即“通过自为改变他的自在”(在多主体的实践性态度下)从而“使自我成为责任的场所”^①,从而使规范性的基础放置在社会性的承认实践中,并在这个过程中将自身形成的经验演绎成“历史性的存在”。^②这包含着两个要点,首先是自我意识是一项社会成就。其次,“承认是一种规范态度”。^③借助这两点,布兰顿在进行着承认和被承认相互运动的个体间通过话语实践而确立起承担责任和权威使用的规范资格。据此可以看出,布兰顿对黑格尔承认理论的改造性理解只是为了服务于阐发他的推论主义的规范语义学,这个过程赋予语言一种本体论范畴的意味,却剥夺了实践主体的多维性(实践的主体不等同于话语实践的主体)。

三、黑格尔承认理论的布兰顿式转化的影响

用“分析化”来断言匹兹堡学派的哲学家们对黑格尔哲学的消化与利用,其合法性是有待论证的,但我们借用这个“分析化”的名称来为布兰顿等人所做的工作进行界分,意在于引出英美分析传统与大陆哲学资源在厌倦了各行其道之后寻求融合的思考路向。分析传统对黑格尔哲学的兴趣能将其哲学引向什么样的表现样态、以及会产生怎样的思想后效,这都是有待观察的重要问题。但就布兰顿等人迄今所做的工作的影响来看,至少在以下方面我们可以尝试提出商榷。

(一) 实践维度的语言分析化

语言的转向成为后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发展趋势,这使分析哲学家们认为,超越语言而去搭建一个超历史的意识框架是一项必须要放弃的事业。所以在分析哲学家那里,企图通过反思而去寻找到“意识”或“自我意识”作为获取世界的知识及其明晰性的哲学是一种坏的哲学。而早期的分析哲学家们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事业就是这种坏哲学的范例。而匹兹堡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这种思想潮流之下来发展他们的哲学,在语言转向后的语境当中来消化黑格尔就使他们的思想形态与叙述方式呈现出非常不同于古典实用主义者在处理黑格尔时的方式。将语言放在思考的核心位置是匹兹堡的传统,这一点,在布兰顿那里非常有代表性。

布兰顿的推论主义语义学是在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思想的导引与铺垫基础上消化黑格尔的社会性视域,把相互承认置换成推论活动,再将规范建立在使用语言的生物的空间中来论述。布兰顿甚至在

① 布兰顿认为,黑格尔所用的引人入胜的殊死斗争的故事生动地描述了从自然过渡到精神这个重要的方面。但是,精神的领域——即我们规范性的和概念性的表达行为——是一个一直运动的活的事情,我们不得不失去的、去冒险的和牺牲的大部分东西,都不是生物性的,而是文化上的东西。(Robert B. Brandom, “The structure of desire and recognitio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33 no 1, (2007) p.131.) 也就是说,一个人的身份认同实践是一系列的冒险与牺牲的自我转化过程,是一项社会性的成就,也是一项历史性的成就。

② Robert B. Brandom, “The structure of desire and recognitio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33 no 1, (2007) p. 127.

③ Robert B. Brandom, “The structure of desire and recognition”, *Philosophy & Social Criticism*, vol 33 no 1, (2007) p. 136.

《精神现象学》中找到了一条隐藏的线索即“作为精神的特定存在的语言”^①来使他对黑格尔的使用合法化,并借黑格尔的资源来表述他的语义规范性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概念的使用决定概念的内容,换言之,概念离开了使用就没有任何内容。”^②总的来说,布兰顿在语言学转向后的语境中构造出这样一条路线,它是概念实在论的,并且是一种基于推论的规范语义学。前者使他与詹姆斯、杜威等所走的经验主义划开界线,而坚持一种理性主义;后者则是在改造黑格尔的相互承认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规范的关键性理解。

布兰顿显然紧紧抓住了“对话是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这样的信念,而且,也许布兰顿是赞同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的判断——“语言比经验是更富有成果的话题”,以及实用主义只有语言化,才可能包含着它的新生。^③在布兰顿对黑格尔精神概念的解读核心处,他通过承认理论在精神和语言之间建立起特定的联系。但我们回到黑格尔哲学本身,会发现被布兰顿“语言化”了的黑格尔哲学实践维度被剥夺了其超凡的深度。黑格尔通过承认理论所追求的是一种更广泛的目标,他借着一种关于规范的原初性构想,规定了对于个人而言过一种伦理生活意味着什么(这包括如前文所述的自由本质的阐明、理性国家制度的勾勒、善的生活的现代性版本等)。这就不仅仅是语义学、语用化框架中讨论一种身份、一种资格、一种形而上学的交互。真正的黑格尔哲学有着切入世界现实的力量,他并不仅仅是一个思辨的逻辑学家和形而上学家,“而是一个哲学的历史学家、一个政治和社会理论家、一个有关我们的伦理学问题和文化同一性危机的哲学家”^④。当承认理论只落在语言主体言说的理性空间中时,关于实践多层面的层层矛盾与冲突以及因此带来的危机与解决就都在语言的筛网中过滤掉了。

在布兰顿的理解中,黑格尔的相互承认关系中包含着自我立法,也包含着规范身份资格的构成性成分,所以,承认机制就包含着理论与实践主体的统一。但这里的实践实质上主要还是话语实践。皮平就批判布兰顿的话语记分实践(discursive score-keeping)是对黑格尔的双重背叛:第一重背叛是布兰顿的个体主义还原背离黑格尔思想,尤其在实质上是背离黑格尔的整体主义的;第二重背叛是布兰顿的方法论抽象与唯心主义化直接过滤掉了黑格尔对康德的历史改造,这在本质上又背离了布兰顿本人所倚重的黑格尔哲学之历史性教养。布兰顿用“话语实践”简化了黑格尔的“实践”,这使黑格尔哲学“实践”概念的深度单薄化,这构成了对黑格尔哲学的一个基本主旨的辩证性质——概念是作为对历史进程的哲学反思的结果且在概念中才能去理解时代中的世界——的违背。在黑格尔那里,再抽象的概念也是拥有历史向度的或者说作为对历史进程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布兰顿所主张的“世界是概念化的世界”是对黑格尔哲学精神的承续,但概念是对历史进程的哲学反思才获得其具体内容与可理解性的,在这一点上,布兰顿只在“话语实践”(推论关系)中就确定了概念的内涵与可理解性,这是一种简化替换,同时也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抛在了一边。布兰顿专注于其话语实践,那是命题与命题之间的推论关系,只是语用学上的实践。

(二) 历史意识的稀释化

历史意识对黑格尔意味着什么?这是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最机要之处,这也是领会黑格尔哲学在整个西方哲学发展传统中地位与意义的枢纽之处。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意识意味着系统的方法直面时间性问题,要完成在思想中把握时代。这就注定黑格尔哲学要与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哲学逃避时间性传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下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82页。布兰顿的这种发现在黑格尔那里是贯穿其哲学的一个主张,在他的早期论述《基督教的精神及命运》中就明确表达“惟有人精神才是人的言语与行为的连结者。”《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4页。

② Robert Brandom, “Some Pragmatist Themes in Hegel’s Idealism”,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7: 2(1999), p.164.

③ 理查德·伯恩斯坦《美国实用主义:诸叙事的冲突》,海尔曼·J·萨特康普编《罗蒂和实用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95—96页。

④ Allen W. Wood, *Hegel’s Ethical Though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5-6.

统的对立,而这种对立,要以扛起整个哲学门类旧问题的重新解答为任务。而只在分析哲学的问题框架中使用黑格爾的历史性意识,这种结合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分析传统一直缺乏历史感的不足,但也一定会造成对黑格爾历史意识的宏富内容的稀释、磨损甚至扭曲。

匹兹堡哲学家们引入黑格爾的历史性与社会性视野,所要完成的是对规范性来源的说明以及相应的客观性的重建,即借用历史性中所蕴含的变易性和相对性来拒绝先验的、不受时间干扰的普遍物。但布兰顿使用黑格爾历史意识的方式却只是将其放置在言语行为的单纯交互中,因承认彼此的规范性资格而使得话语实践能够进行,历史意识立即被减缩成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具体处境性。而且,在布兰顿的话语实践中进行着承认活动的个体实际上已是被抽象到极致的个体,而黑格爾的历史意识恰恰是为了实现对个体最大程度地具体化。在黑格爾那里,具体化的个体才是现实的、可理解的,所以包含着生死斗争的承认活动是揭示历史中的个体之具体的复杂性的过程;而布兰顿哲学中话语实践的个体则成了推论网络中的符号,这实质上是一种对个体的符号化抽象,个体成为背负着符号系统的普遍物而被抽除了历史,因为这实质上是在论述一种不变的符号关系结构,这是一种非历史的思考方式。这就决定性地背离了黑格爾哲学的历史意识。

而且,布兰顿的这种哲学处理方法,实质上是将黑格爾哲学最核心的精神概念所蕴含的、通过其成长历程的矛盾运动以及在现实历史的表现中所经历的种种冲突平面化,从而失去了精神养成史的辩证逻辑所蕴含的精神内在性与整体动态性。在黑格爾承认理论的中枢——自我意识的阐述中,从意识到自我意识的发展的每一环节都是矛盾冲突与自身突围的过程,它既是“我把我自己同我本身区分开来”而达到“没有差别的差别”^①,也是“从他物的回归”的“运动”^②,在这个过程中,承认的中介序列揭示出自我意识的生长机能。意识的辩证进展正是黑格爾阐明历史性的过程,这个过程中交缠的对立统一是真正精神性的东西,它揭示出黑格爾辩证法的精髓即精神内在性与逻辑动态性的统一。当匹兹堡哲学家们在语言转向后的分析框架中来理解黑格爾承认理论中的历史性时,它被解释为具有语言能力的(理性的)个体在社会性交往共同体中的语言教养与形成共识,辩证法的精神在略为粗糙的语言理性与语言交往的解释中不复留存,相应地,“黑格爾哲学的历史性”只剩下语言化的标签使用了。这与黑格爾哲学是非常异质的思维进路。

总的来说,虽然布兰顿借用了黑格爾承认理论中所包含的主体交互性来说明规范生成的基础,但这就是在“后康德”的认识论框架中来理解和消化黑格爾资源,不但使其历史意识被稀释,甚至还在这个过程中将辩证逻辑与黑格爾的哲学内容相剥离,损害了对辩证法教益的领悟。

(三) 黑格爾哲学关键性概念的边缘化与误读

布兰顿对黑格爾哲学的解释与利用,被其批评者认为他并没有真正把握黑格爾哲学基础性概念的实质内涵,尤其并未真正领会对黑格爾本人的思想筹划来说重要的两个层面:一是宗教教养对于人类精神成长史的关键性作用;二是黑格爾的真无限概念对其思辨思想的根本性地位。

首先,关于宗教教养对于人类精神成长史的关键性作用层面。黑格爾是通过考察人类精神的成长史而将宗教置于精神教养的重要阶段的。在黑格爾那里,于启蒙的成果而言,理性的自我意识以及因这种自我意识而获得自由的可能性是有限制或有条件的,这在基督教的道成肉身以及三位一体的教化中就显现出来:神通过克服他与自然之间的相互外在而道成肉身,为了人类这个他者而放弃了为神这个无限欲望,这种放弃虽然对于神的自我启示而言是必要的,但根本上是爱的自由行动,通过这个行动,神自己规定自己,在自身内设定有限性,从而通过承认他者而和解了无限性与有限性,且看到了自身的理性。因此可以说,宗教的道成肉身这个概念中,含着对黑格爾所要完成的东西的提示。如果缺少了宗教阶段通过对神的认知而产生的教化史,而将精神以及其中的理性当作是一个现成的东西来分析,直接将其置于人类社会空间中,并想要通过各理性之间的相互承认活动而确定规范,这缺少了黑格爾所说的真正的

^{①②}黑格爾《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第127、131页。

“和解过程”(无限与有限、人与自然、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和解)的教养,这个和解是宗教启示给人类精神的自我认知的。所以,黑格尔在《宗教哲学讲演》中强调“宗教意识包含着所有事物的根源,通过它,人类获得了真理,它是一切责任的根源;所有的权利和义务都取决于这个最根本的形式。”^①在他看来,宗教的这个教义对于认识精神、理性、自由来说是必要的,人怎样理解自身取决于怎样表现神,因此,他主张“神是精神”:“神,因为它是精神,就必定规定自己,在自身内设定有限性(否则神就会只是一个僵死的、空洞的抽象)。”^②在黑格尔那里,要理解精神,宗教的视角是必要的。

而对于相隔启蒙时代已经过于久远的当代分析哲学家来说,对理性和精神这些概念的理解是一个基本达成共识后就现成而用的基础性概念。虽然,时代之间的哲学思想在表达重点、倾向上总是有自身的特征,但是,当把黑格尔当作是理解某个概念而必要的东西视若无睹时,这就非常地“非黑格尔”了。而布兰顿是在这种启蒙后世俗化的社会空间中理解理性,并试图通过理性的人们在相互承认的关系中就构建出理性的规范,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去黑格尔化”操作。

其次,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来说反映其哲学特征的真无限概念,布兰顿并没有把握到其真正内涵。布兰顿主张黑格尔理解规范性的资格,即“对于黑格尔而言,所有的超验性的构造物都是社会性产物”^③。这种视野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对于分析哲学与大陆哲学的融合提供了一种新的能量点。但对于“社会性”之首要性的强调忽视了真无限概念在黑格尔思辨哲学体系中的重要性。因为在这种思路中,黑格尔成为一个实用主义者、在谈论概念时的文化相对主义者。按布兰顿批评者的说法,布兰顿误读了黑格尔看待社会的和理性的之间的关系,这种误读将后者的优先性遗漏而强调前者。^④这就关涉黑格尔哲学中真无限概念认识的重要性:在《逻辑学》中,黑格尔称真无限概念是哲学的基础性概念,无限定义着思想之行动自由的本质。他的下述一段文字表述了理性(逻各斯)的先在性:“……这个概念本身乃是有了规定的诸概念的基础。这个概念本身是不能以感性来直观或表象的;它只是思维的对象、产物和内容,是自在自为的事情,是‘逻各斯’(Logos),是存在着的东西的理性,是戴着事物之名的东西的真理;至少它是应该被放在逻辑科学以外的‘逻各斯’。”^⑤有了这样的理性先在性,立足于相互协商的社会承认机制才会具有创建的前提。也就是说,社会空间内行动的自发性需要思想的自发性。黑格尔通过《逻辑学》给出了关于精神和自然的更深层次的本体论结构,奠定起理性优先于社会性的逻辑顺序。真无限概念能够解释真正的自主。

但在布兰顿的解读当中,概念是立足于社会承认活动之上的,理性对社会的优先性被决定性地调转。按布兰顿的解读,我们作出的选择(自主)取决于规范性态度,这种“取决于态度的规范性资格”(attitude-dependence of normative statuses)是启蒙传统的理智性成就,它导致了一种世俗性在道德、法律、政治的规范性概念中的奠基地位,认知者和行动者以一种独特的负责任的方式来行动。也就是说,那些约束我们自己的规则是我们自己采纳而加诸自身的“在非规范的受动性(compulsion)与规范性的权威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只为我们认可为权威的东西真正规范性地负起责任。”^⑥在这种决定性的倒转当中,布兰顿刻画了一个非形而上学的黑格尔,并力图使他所借用的黑格尔资源所表达的哲学意图符合于历史的黑格尔所要完成的东西。但是,从本体论视角来看,如果黑格尔称为“逻各斯”的东西以及概念如果不是在先的,作为承认活动的机制——社会协商(social negotiation)的过程如何能够发生并展开?

① G. W. F. Hegel, *Lectures on the Philosophy of Religion, vol. I*, Edited by Peter C. Hodgson, Translated by R. F. Brown, P. C. Hodgson and J. M. Stewart,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300.

② 黑格尔《精神哲学》杨祖陶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页。

③ Robert Brandom, *Tales of the Mighty Dea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216.

④ Alper Turken, “Brandom vs. Hegel: The Relation of Normativity and Recognition to the True Infinite”, *The Hegel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2015, Hegel Bulletin* 36/2, 225-247, p.226.

⑤ 黑格尔《逻辑学》上卷,杨一之译,第17页。

⑥ Robert B. Brandom, *Reason in Philosoph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62.

就如保罗·利科在分析承认活动时所表达的那样:在承认结构当中,相互承认以及因这种承认而建立起的规范性资格是以一个人具有承认他人权威的能力为前提的;而承认的被动形式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个体的自我承认被放到结果的位置。^①质言之,自主是社会性行为的逻辑前提条件,理性优先于社会性是取决于规范性态度的规范结构的自主前提。

结 语

布兰顿以分析哲学家的方式践行了黑格爾的去先驗化倡導,對規範的理解從先驗分析扭轉到經驗路線上,將黑格爾哲學的歷史性、社會性教養注入語言哲學的主脈中,並將“實踐”維度在哲學中的重要地位重新強調起來,這既是對黑格爾這位具有超凡深度的思想家的哲學遺產的選擇性繼承,也是對布蘭頓自己的實用主義前輩(尤其是皮爾士、杜威以及羅蒂)的核心思想的重新激活。但是,作為思辨哲學家的黑格爾關注的不是現象,而是現象的可能性,這就使他的哲學討論絕不會只停留在經驗性層面並走經驗性路徑,而這正是布蘭頓解讀與使用黑格爾的路徑。布蘭頓又進一步將語言實踐泛化為一切實踐活動,這又進一步裁剪了黑格爾哲學所表達的內容體量與整體性。分析哲學的分析方法追求的清晰度,如果有損於思想內容的完整與真旨,這或許要拷問其清晰度的意義。

Brandon's Transformation of Hegel's Theory of Recognition

Yang Xingfeng

(School of Marxism, Guangxi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4, China)

Abstract: Among the multiple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s and selective uses of Hegel's Theory of Recognition, Robert Brandon who was based on the analytic tradition is outstanding. But to what extent Brandon's analytical transformation and utilization is in line with Hegel's ideological purport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 system, this reflects not only the crux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Continental-Analytical tradition" in seeking for an integration, but also the development impulse of the Anglo-American analytical tradition to seek for an explanation of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fter getting tired of the formalized analysis approach. Brandon and the thinkers of the Pittsburgh School, with the tradition of analytical philosophy, have tried to rediscover the Recognition Theory of Hegel's philosophy in the context of the "linguistic turn", which may bring about many after-effects and conclusions that need to be discussed. The paper is intended to present this kind of philosophical adventure and conceptual conflict caused by the reuse of Hegel's philosophical resources.

Key words: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Theory of Recognition; Robert Brandon; Pittsburgh School; analyzed use

(责任编辑 刘曙光)

^① 保罗·利科《承认的过程》,汪堂家、李之喆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49—150页。